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3.2

社會學作為志業

André Béteille, Jacklyn Cock

中東政治

Mustafa Attir,
Sari Hanafi,
Feras Hammami

葡萄牙對危機的回應

José Soeiro,
Dora Fonseca,
Maria Luísa Quaresma

- > 台灣社會學的三波轉向
- > 小國社會學
- > 智利的道德議題
- > 智利的環境政治
- > Santiago的移民
- > 國際化社會學
- > 美國社會學衰落中？
- > 巴爾幹化之外的巴爾幹島
- > 跨學科性
- > 社會學和社會轉型
- > 全球社會運動
- > 聯合國的青年參與
- > 影像社會學：真實的Bedik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2期 / 2013/2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編的話

面對不平等的世界

我在 Ramallah 寫下這篇文章。Ramallah 是巴勒斯坦政府在 West Bank 的行政中心，也是一處例外之地：這裡所見的宰制型態影響著社會學知識的生產，程度並不亞於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這裡的地理切割、隨處可見的檢查哨、以及把巴勒斯坦人逐出其土地的高牆等等，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遂行以色列的單邊擴張。若說 Gaza 所遭受的是一連串炸彈攻擊的迅速與恐怖的暴力，那麼，以這期全球對話中 Jackie Cock 的文章角度而言，West Bank 正在經歷的則是慢暴力。

West Bank 的人活在不確定與危險的環境下，其高等學府的命運也是如此。雖然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施加的暴力沒有停過，但是巴勒斯坦重新定義其自身的努力也未曾停歇。例如，在 Abu Dis 的 Al-Quds University 大學實行了一項特別的計畫，稱作 Campus in Camps，目的要把大學教育帶入難民營中。此外，一個由 Alessandro Petti、Sandi Hilal、和 Munir Fasheh 等人發展的概念：「集體字典」，則由 15 位從難民營中來的青年男女所實踐，問題化許多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包括公民身份、參與、幸福、永續、知識、關係、公共等，並注入在地的新觀念。這種 Freirean 式的教育為難民營的社會意識帶來了轉變，因為這裡不再是逃難之地，而是一處政治空間。

如這期全球對話中 Feras Hammami 所言，例外狀態也影響著宰制者。以色列政府就壓制其大學內的異議教授。不過，以色列並非特例。Mustafa Attir 描述了 Gadhafi 政權下的社會學境況，以及新政府所帶來的挑戰。智利社會學家 Oriana Bernasconi, Alejandro Pelfine 和 Carolina Stefoni 則論述了民主轉型的限制和矛盾，包括道德、環境、遷徙等面向。蕭新煌分析台灣社會學的歷史軌跡時也論及民主化，說明台灣社會學如何從進口美國理論與方法開始，到轉向批判國民黨威權體制，並在政治民主化中扮演一席之地。從另一個沒那麼樂觀的立場出發，黃樹仁對小規模的台灣社會學進行了批判與反思。

上述許多的限制並無法阻礙不斷創新的社會學介入實踐。如我們從 José Soeiro 和 Dora Fonseca 的文章中所看到的，葡萄牙社會學家們發展出了反對擲節的新動員方式，許多點子是從拉丁美洲而來。Current Sociology 的主編 Eloísa Martín 敘述了全球北方學術規範所面臨的困境，這些葡萄牙的年輕學者則把關懷放在相反地地方：另闢蹊徑，重新定義社會學，挑戰第三波市場化所帶來的毀滅性政治侵襲！

全球對話以 14 種語言刊出。請到 [ISA 網站](http://isa-berkeley.org) 上可閱讀全文。投稿請寄給：burawoy@berkeley.edu



André Béteille 是印度最傑出的社會科學家之一，討論社會學和人類學的關係，並說明社會學如何再政策中保持批判的自主性。



Jacklyn Cock 是女性主義者、環境運動者、也是批判思考者。他分析了一種普遍但是緩慢的暴力形是，不僅在南非上演，也是社會學的核心主題。



Sari Hanafi 訪談利比亞社會學家 Mustafa Attir。他描述了在 Gadhafi 獨裁下的社會學以及新政府下所要面對的挑戰。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Célia da Graça Arriba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Rossana Marinho.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Hamidreza Rafatnejad, Saghar Bozorgi, Zohreh Sorooshfar, Faezeh Khajehzadeh.

日本:

Kazuh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Takako Sato, Shohei Ogawa, Tomoyuki Ide,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Krzysztof Gubański,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Adam Müller, Tomasz Piątek, Anna Piekutowska,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Justyna Witkowska, Zofia Włodarczyk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s, Ileana Cinziana Surdu.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Ekaterina Moskaleva and Julia Martinavichene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Ayti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ı, Zeynep Baykal, Gizem Güner.

媒體顧問: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面對不平等的世界

2

社會學作為志業：實用主義的觀點

by André Béteille, 印度

4

社會學作為志業：慢暴力

by Jacklyn Cock, 南非

6

> 中東政治

獨裁統治下的利比亞社會學

An Interview with Mustafa Attir, 利比亞

8

以色列大學的政治危機

by Feras Hammami, 瑞典

11

> 葡萄牙回應政治危機

壓迫者劇場：新的公共社會學？

by José Soeiro, 葡萄牙

13

不變的危險

by Dora Fonseca, 葡萄牙

15

流沙中的社會學

by Maria Luísa Quaresma, 葡萄牙

17

> 台灣社會學

台灣社會學的三波轉向

by 蕭新煌, 台灣

19

小國社會學的困境

by 黃樹仁, 台灣

21

> 智利的民主化

智利的道德議題與個人自由

by Oriana Bernasconi, Universidad Alberto Hurtado, 智利

23

智利環境政治的局限

by Alejandro Pelfini, 智利

24

智利Santiago的移民

by Carolina Stefoni, 智利

26

> 國家與國際

國際化社會學的挑戰

by Eloísa Martín, 巴西

28

美國社會學衰落中？

by Bronwen Lichtenstein, 美國

30

> 會議

巴爾幹化之外的巴爾幹島

by Svetla Koleva, 保加利亞

32

跨學科性

by Clarence M. Batan, 菲律賓

34

社會學和社會轉型

by Leslie Lopez, 菲律賓

36

全球運動與在地憤怒

by Benjamín Tejerina, 西班牙

37

> 特輯

聯合國的青年參與

by Jovanni Rodriguez, 美國

38

影像社會學：真實的Bedik

by Eryn Snyder, 美國

39

> 社會學作為志業

實用主義的角度

by André Béteille, Delhi University, 印度



André Béteille 被稱為是印度「最有智慧的人」，非常理性。他最經典的著作：「卡司特、階級、權力」把韋伯社會學帶入了人類學的村莊中。他的著作包括了不平等和其他各種公共議題。他也得過了許多獎項，並且擔任過印度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會長。後來他從總理的國家知識委員會一職退休，期間推動以卡司特為基礎的保留地區。他同時也是一位公共社會學家，有著很好的專業為後盾，在報章雜誌上發表言論，以社會學的立場對公共政策和公共意見發表看法，提出批判。

André Béteille，近期於Delhi攝。

社會學作為志業，必須要求學者去維護這個學科的專業性，同時若我們要追求社會學作為志業，而不僅是職業，則光是強調技術是不夠的。不過技術還是很重要。總之，社會學作為專業學科已經發展成了一個很大的體系，透過各種概念結合在一起，包括方法和理論，提供了社會學家很充足的研究資源。

社會學必須和常識做出區分。常識通常有限，並且許多預設都未經檢驗。所以社會學雖然不該鄙視常識，但是要更深地去分析社會的肌理運作。社會學會

比像是物理或是分子生物學等更難和常識做出區分，不過我還是要強調：社會學和一般的常識與報導並不相同。

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主要有3個特徵：(1) 這是一門經驗科學；(2) 這是體系化的知識；(3) 這是一門比較的學科。作為經驗科學，社會學要在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中做出清楚的區別，在實然和應然中區隔開來。可以確定的是社會的研究當然包括價值和倫理，但是社會學研究規範是從敘述的角度，而非診斷的角度出發。此外，社會學要建立系統化的方法的知識，去分析這個社會的各種

>>

連結關係。最後，社會學要透過比較的方法去分析社會，研究者從自身的社會出發、比較其他的社會。

同樣地，我也用比較方法，並且質疑那些認為印度可以有自己的社會學並且完全擺脫西方世界的見解；但是另外一方面，社會學的分析框架的確來自於歐洲和美國，包含了許多有問題的預設，所以並沒有理由相信這些框架是永恆不變的。事實上這隨著時間變化，而且我也寫討論不平等議題的專書，希望讓大眾可以閱讀。

在長年的教學經驗裡面，我長期在主要的學術機構之中。和其他同事一樣，我總是要在「社會學理論」和「印度社會學」之間取得平衡。在理論課，我教馬克思、韋伯、涂爾幹、帕深思、莫頓等；在印度社會學課，我教村落、卡司特、聯合家庭等。所以很自然地學生總是覺得這兩個課程沒什麼關聯。

我的教學生涯中發展出了一種「社會學推論」的概念。在解釋與定義社會學之後，我會討論這種議題。通常會從政治議題開始，像是「政治作為社會學的研究主題」。畢竟，政治對許多人來說是密切相關的。我問的主要是社會學是否有一種獨特看待政治的視角。同樣，我們也可以問宗教。宗教在印度吸引了廣大的神學與哲學的研究，且早於社會學。所以，我們不禁要問：社會學可以帶來更新的方式去理解宗教嗎？一樣，我們也可以問家庭、親屬、婚姻、以及許許多多其他主題。

我已經用社會學的角度從事提問與研究，並把結果帶給公眾。我的想法是社會學應該為自己的專業而著述，但這不

是唯一目的。社會學家也有接觸公眾的社會責任。因此在發表論文之外，我也編輯報紙文章，像是 The Times of India, The Hindu 和 The Telegraph 等。雖然我為報紙寫文章，不過我也避免像是記者報導一樣表面地評論。反之，我以更廣的歷史或社會觀點去詮釋社會現象。

我的看法是，作為社會學家，我不是倫理學家。我的興趣是比較社會不平等。不平等是一個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問題。印度知識分子喜歡不平等的善惡兩面道德化，可是不平等不會就此絕跡。我已經投入許多的時間精力去理解各種不平等的面向與其結果，如何轉變、弱化、強化某些制度。我想我還是要維持這個實用主義的態度去處理平等與不平等的議題，並且反對烏托邦或是命定論的思想，因為這兩種思維不過就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

> 社會學作為志業

慢暴力的危害

by Jacklyn Cock,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南非



沒有社會學家比Jackie Cock更投入社會實踐了。他是南非社會學的先驅。持續研究暴力與不平等的關係。從她經典的研究Maids and Madams，家務工作的女性主義分析，到Colonels and Cadres，性別和戰爭的檢視，以及The War Against Ourselves所揭露的環境不正義，我們看到Jackie Cock用社會學處理了廣泛的不正義議題。

Jacklyn Cock再南非的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主持會議。

社會結構和過程形構著我們的經驗，不過總是隱微地、並且被傳統的思想、掌權者的利益、官方說法等蒙蔽著。其中一個最危險的就是暴力總是被理解成事件或是行動，是可見的。可是對人類最有害的卻是「慢暴力」。Rob Nixon 所說的「慢性死亡」就是這個意思。這是一種逐漸發生的暴力，不可見，卻穿透時間與空間存在著。這種暴力通常不被認為是暴力。環境污染和營養不良就是這種慢暴力的展現。這樣的例子都不是那麼顯而易見，但都深深危害著人類。

食物有關的議題包括了：不平等、氣候變遷、全球化、飢餓、商品化、都市化、健康。食物並非總是被認為和暴力有關。只有在除了和食物有關的社會抗議包發時(2008年世界各地30多個城市)才會被聯想在一起。可是營養不良總是以「慢暴力」的型態出現，因為這影響深遠，卻不可見，慢慢地侵蝕著人體。最有力的證據是全世界有10億的人口營養不良。在南非，每4個6歲以下的小孩就有1個是因為營養缺乏而發育不良。

此外，「食物不安全」的概念太過於

>>

空泛和衝向，讓飢餓和營養不良之間的界線變模糊了。傳統媒體總是傳播著在索馬利亞的殘骸和乾旱的難民形象，但是食物不安全一點也不能解釋什麼，甚至會隱藏許多訊息。營養不良時常和都市貧窮人口的肥胖連在一起，這些人依賴廉價食物，含有高卡洛里，但營養缺乏。這些現象並不是顯而易見的。

二氧化碳以及所導致的氣候變遷是最主要的環境污染例子。這個污染持續影響著南非的窮人。許多這些污染以「慢暴力」的方式進行著，持續且不可見。那些廣泛的影響巨大地污染生態，帶來災難。Bhopal 和 Chernobyl 就是慢暴力最好的例子。

靠近 Johannesburg 的 Steel Valley 裡面，鋼鐵工廠的污染簡直就是一場災難。這場災難緩慢但是持續。這個「慢暴力」穿透力相當強，把有毒物質滲透到土地各個角落，緩慢地透過空氣和地下水，造成各種疾病、基因損害、癌症，危害動物與人類。

許多的污染，包括身體和河流等，都是隱藏的，無論從感知和理解上來說都是如此。這些污染以不可見的方式讓大眾暴露其下。像是 Ulrich Beck 所說的「社會認可」就是社會學的任務，特別是在 Steel Valley 的例子就是如此，污染對人類的為些總是被藏起來了。而那些鋼鐵工廠的管理者，和那些無在乎又無能的政府官僚一起狼狽為奸，企圖卸責。

但是社會學對於人類解放的潛力遠超出「暴露在解釋之下」以外。上述兩個「慢暴力」的例子都有其根源與後果。環境污染的例子中我們看到環境成本的外部化，導因於企業的權力；而在營養不良的例子中我們發現食物體系的運作來自於金錢誘因而非人類需要。

「慢暴力」並非無視階級。窮人最容易遭受慢暴力的衝擊，包括營養失調與環境污染。他們這些孤立的個體必須面對這種掙扎的處境。但是個體經驗如何被更廣泛的社會過程所影響正是 C. Wright Mills 的主要關懷和影響。所謂「社會學想像」意味著社會學家和常民一起在真實世界中實做（而且我認為最基本的問題是取得營養時食物和乾淨的水）。

Michael Burawoy 把這種行動理論化為 2 種方式：「延伸個案法」和「公共社會學」。前者包括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對話，是一種理性、尊重、反身的方式。社會學必須把知識延伸到那些被研究者上，不論從上、從下，社會過程可以被觀察和嚴謹的被分析。同樣，「有機公共社會學」也讓「可見變成不可見」，然後更緊密的和「可見、深厚、行動、反面的公眾」結合。這包括了要去強調集體通作和拒絕 C. Wright Mills 所描述的「保護學者的隱私」。在這個高度個體化和新自由主義化的時代，社會學要和貧窮與被壓迫者站在一起。

如此一來，社會學可以強化社會運動，動員集體行動，處理像是「食物主權」或是「環境正義」的議題。這些運動都和社會正義有關，挑戰企業權力和要求建立各種落實人類解放的社會制度。■

> 獨裁期間與之後的 利比亞社會學

訪談Mustafa Attir



(Mustafa Attir，一位在獨裁統治下存活的社會學家。

Dr. Mustafa O. Attir (以下簡稱 MA) 是 University of Tripoli 的社會學教授，永續發展研究中心的執行長，也是阿拉伯社會學會的前會長。其著作主題包括了利比亞社會的現代化影響。他接受了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 的社會學教授，ISA 執行委員，2011-2014，以下簡稱 SH) 的訪談。

SH: 可以請你告訴我們你在利比亞的學術軌跡嗎？

MA: 我在 University of Libya 的博雅學院拿到社會學學士。1962 年，我學校送我到美國唸書，然後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拿到碩士，在 1972 年於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拿到社會學博士。後來回到利比亞教書，也擔任許多職位，包括了博雅學院院長，大學研究中心執行長，以及校長。

SH: 我出席了一個阿拉伯研究中心的會議，其中許多左派和民族主義者批評 NATO 干預利比亞，你的立場為何？

MA: 阿拉伯之春最早就在 2011 年 2 月 17 日的利比亞開始的。起初是一個在 Benghazi 東邊的一個和平抗議活動，可是政府用武力強硬回應。不過，政府過度強

>>

硬的暴力舉動並沒有冷卻抗議的熱潮，反而蔓延到全國，最後像是全民的革命一般席捲。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政府控制了北邊，但是其他東部、西部、南部還是在反抗軍的掌握中。後來開始陷入內戰，Gaddhafi 的武力遠超過民兵部隊。媒體讓西方世界知道 Gaddhafi 的暴力鎮壓舉動。很快的聯合過安理會就通過決議要在利比亞上空建立禁航區，盡一切可能防止對民兵的攻擊。這個決議因此也讓 NATO 介入，禁止空軍和海軍，保留地面部隊給反抗軍。246 天之後戰爭結束。若沒有國際的支援，按照 Gaddhafi 的無情，利比亞的人民可能從此不見天日。

SH: 你如何在獨裁政府底下生產社會學知識呢？你生產了什麼樣的知識？

MA: 在利比亞教社會學並不容易。獨立設計課程，然後保持內容的不受意識形態打壓也很不容易。我在美國受教育，深受經驗研究和量化的影響，並且很關係現代化和社會變遷。這些議題對利比亞來說和阿拉伯其他國家是很有關係的。利比亞人口不多，劃分成很多部落，又彼此緊密相連。而我因為金錢資源充足，又是第一個社會學博士，要和政府官員打交道的話或是申請研究經費，我沒什麼困難。為了避免找上麻煩，我不碰宗教和政治兩項議題。不過我研究犯人，特別是那些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和阿拉伯阿富汗人。雖然政府提供資金研究，不過要把研究發現落實到政策上並不容易，因為學術和政策之間的關係很弱。

SH: 利比亞的大學有政治肅清那些和 Gaddhafi 政府走得很近的知識分子嗎？

MA: 利比亞的大學教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在 1969 年 Gaddhafi 政變前拿到學位的傑出學生，多數在西方國家受教育（美國、英國、德國、法國），這些人獻身專業，投入教育。第二種是在 Gaddhafi

意識形態下的學生。那時是一黨專政，雖然學生多少加入一些政治團體，不過 Gaddhafi 要大家遵從他的意識形態，多數也照做了。1976 年他命令那些服從他意識形態的學生去掃除那些所謂的反動派學生，於是衝突一觸而發，受傷和被逮捕的學生不在少數，有的更被迫退學。後來他要邱組織那些追隨者加入革命委員會。成員都要背誦 Gaddhafi 的言論，唯命是從。其中還包括把學生吊在校園內。

按照校規，其實只有傑出學生才可以出國唸書。但是從 70 年代開始，那些加入革命委員會的人都可以出國。這些人多半不是真的想唸書，所以多數不能到好學校，只拿到三、四流的學位，可能在東歐或是其他阿拉伯學校。最後回來教書的話，也是宣傳 Gaddhafi 的意識形態。所以利比亞的大學重新開放後，有些老師離開、被迫走人，可以留下的就是和政權有良好關係的人。家族和宗族關係可以勝過於法律。這一向如此，接下來也還會一樣。

SH: 在利比亞革命中，知識分子的角色重要嗎？

MA: 利比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當反抗爆發時，會不會成為革命都是未知數。知識份子用現代科技帶動了革命。不過，在 2 月 17 日是突尼西亞起義。這和 Benghazi 於 2006 發生屠殺事件是同一天。在 2011 年以前人民也會抗議，不過數量不多，也很容易被警察驅散。年輕人在 2011 年於 Facebook 上討論和策劃抗議行動，政府也都知道。只是後來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的經驗鼓舞了利比亞更多的人加入抗議行列，即使在 Benghazi 的 Tripoli 和其他城市的人也都準備參加，政府暴力鎮壓也激怒了更多的人。抗議持續進行，年長者也加入了。後來大家都接受了這樣的觀點：政治改變唯有從政府本身開始才有可能。

SH: 作為社會學家，你如何看待利比亞

的未來？

MA: 在革命期間的口號是推翻政府、Gaddhafi 下台，建立民主。你不可能忘記一項事實：12% 的人口在 Gaddhafi 的掌權時出生。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被教導利比亞當時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沒有政黨、選舉、代議士的民主制度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媒體都被政府控制，用來宣傳獨裁思想，目的在洗腦。利比亞反抗軍成功改變了整個體制，推翻了 Gaddhafi，但我不認為民主就此到來。臨時政府有各種媒體、政黨、選舉等，但是反抗軍還沒有解除武裝。所以軍隊派系林立。所以各個武裝部隊可以自行決定逮捕、審問、囚禁人民。此外，這個國家還有很多極端宗教分子。只要這些團體還是和法律衝突，民主仍是緣木求魚。

SH: 利比亞後革命時代的社會學任務為何？

MA: 今日許多議題的研究已經解禁了。有需多資料可以用來建立新的理論，包括了和政府相關的許多變數。同時，阿拉伯之春也帶來了新的研究領域和方向，深深影響利比亞社會的未來，包括媒體、新的政治人物、國際關係、伊斯蘭團體等。社會學得任務逝去描述這些不同與衝突如何影響利比亞。我深信利比亞社會學前途相當光明！■

> 以色列的大學政治危機

by Feras Hammami,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 Stockholm, 瑞典

以色列高壓管控其大學的教學與研究。



以色列的大學人員最近發起了一項抗議，主要針對以色列國會高等教育委員會 (CHE) 所提出的禁止 Ben-Gurion University (BGU) 的政治系於 2013-14 年招收新生的法案。在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任職的 Gilad Haran 教授發起了這個請願案，認為「以色列的學術自由遭到空前的危機」。當請願案在 9 月開始連署時，以色列政府開始進行言論審查。這是以色列從 1948 年建國以來的頭一遭。這一天也代表了巴勒斯坦的 Nakba (Catastrophe)，也是巴勒斯坦歷史上被猶太復國主義武裝分子種族清洗、被迫遷離、家破人亡的一天。超過 27 個以色列的大學當時支持種族隔離，並直接參與政治和軍事的行動 (Hever, 2009)。

> 以色列政治反對的停滯

Benjamin Netanyahu 的右翼政府禁止了一系列的鎮壓手段去管制以色列的人權團體、媒體、以及法律的批判言論 (Cook, 2012: 22)。以色列學生和教師們一起監督學術環境，在一些「異議」教授的課堂上當起看門人的角色。為了避免政府找上門、丟掉工作、坐牢、甚至生命受到威脅，師生一起自我審查並禁止某些會激怒政府的言論。在 Bar-Ilan 的 Ariella Azoulay 就因為她的政治結社行為而無法獲得終身職。當 BGU 的 Neve Gordon 教授在 2009 年表達其支持對以色列大學的杯葛，一個國會外的團體 Im Tirtzu 就要求該大學把該教授解聘，要「終結那些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仇恨」

(Haaretz, 9/30/2012)。教育部長 Gideon Saar 也批評 BGU 的政治系有「後猶太復國主義」的偏見。Ilan Pappé 教授則因為在 Haifa University 支持杯葛，後來接到了許多死亡威脅，然後被 Knesset 批評，後來只好於 2008 年到 University of Exeter 任教。

Nizar Hassan 是許多得獎電影的導演，他也被 Knesset 教育委員會猛烈批評，只因為他曾經批判猶太學生穿著軍服在 Negev 的 Sapir College 上課 (Cook, 2008)。可是在該校，Bedouin 的女性學生在課堂上被要求脫掉頭巾，卻沒有人覺得不妥。自從 2000 年在 Intifada 的驅逐行動之後，以色列警方和秘密警察就大肆逮捕和審問在大學內的巴勒斯坦學生。Yusef 是 University of Ben-

>>

Gurion 的學生，就因為參加校內阿拉伯學生組織，被警察逮捕，最後喪生 (Gordon, 2006: 194-5)。

➤ 援助軍事佔領

以色列的大學支持軍事研究和訓練，並和武器製造公司 Elbit 和 RAFAEL 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這些軍火公司提供 Israeli Apartheid Wall 一套監控系統，具有 760 公里長，延伸進以色列在 West Bank 的佔領區，好讓以色列政府可以兼併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Technion University 就是被 Elbit 的資金所援助的，好讓其公司的自動武器系統，像是無人飛機等可以幫助以色列在 2008-2009 年可以攻擊 Gaza 走廊。他也提供給該校參與攻擊行動的學生特別的資助。根據 Hever (2009)，Haim Russo 是一位 Elbit 的 El-Op 分部的經理，就擔任 Technion University 理事，而且 Elbit 的董事長也被該校授予榮譽博士。

許多以色列的大學被蓋在巴勒斯坦村落廢墟的上面。這些廢墟是 1948-1967 年被毀滅的。Tel-Aviv University 從未承認他們是建造在 Sheikh Muwanis 村的廢墟上 (居民被迫遷徙和流離失所)。其他大學，像是 Ariel University Center of Samaria 就是建立在違反國際法的 West Bank 屯墾區上。雖然 Ariel College 被以色列和國際人士所抗議，教育部長還是將該校升格成大學。

這些例子顯示出了關閉 BGU 的政治系有其政治動機。就像 BGU 校長 Rivka Carmi 寫給以色列各研究大學的校長的信中說的：「有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因素在威脅著以色列的學術環境…這將不只是 BGU 的個別戰役而已，而是全以色列大學的共同抗戰…CHE 目前核准的決定就像是在以色列學術殿堂上蓋上一塊黑布。」Tel-Aviv University 的 Tanya Reinhart 說：

「歷史上從來沒有大學像這次一樣決議關閉巴勒斯坦的大學。這完全違反了人權和道德，而且大學居然選擇和政府站在一起從事壓迫行為」(Reinhart, 2004)。這對於那些以色列的海外支持者同樣適用。在 450 所譴責杯葛法案的美國學院中，沒有任何一所反對 Gaza 伊斯蘭大學被破壞的行為 (Gordon and Halper, 2008)。

為了回應這些違反人權的作為，世界各地的學術單位要求大學落實憲法中所保障的族群政策。其中巴勒斯坦大學的英國委員會、瑞典的「Action Group at KTH for the Boycott of Israel」、McGill University 的教職員組織、Berkeley 學生會等等已經要求他們的大學和那些支持以色列種族隔離的大學斷絕關係。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是第一個終止與 BGU 合作的大學。在歐洲，260 所學校，20 個不同的國家要求歐洲委員會要將那些違反人權的以色列公司移出歐盟之外。

杯葛以色列的行動似乎傳達出了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意志。不過，過去 70 年來和以色列政府的交涉從來沒有促進和平，也沒有讓以色列更遵守聯合國憲章或國際法。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例子其實可以看出學術自由的力量。如此的訴求可能可以揭露以色列種族隔離的政策真相，挑戰箝制學術自由的監控網絡，並從政治和族群危機中將以色列的大學拯救出來。■

References

- Cook, J. (2012) "The full story behind the war against free speech in Israel's universities."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Accessed on 10/27/2012 from <http://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full-story-behind-war-against-free-speech-israels-universities/11783>
- Cook, J. (2008) "Academic Freedom? Not for Arabs in Israel." CounterPunch. Accessed on 8/11/2012 from <http://www.counterpunch.org/.../academic-freedom-not-for-arabs-in-israel/>

Egeiq, A. (2012) "Epilogue." Omrim Yeshna Eretz - Hekayat Balad (Once upon a Land) / A Tour Guide. Sedek. Zochrot: Tel-Aviv.

Gordon, N. and Halper, J. (2008) "Where's the academic outrage over the bombing of a university in Gaza?" CounterPunch from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08/12/31/where-s-the-academic-outrage-over-the-bombing-of-a-university-in-gaza/>

Hever, S. (2009) "The Economy of the Occupation - A Socioeconomic Bulletin." Jerusalem: The Alternative Information Center. Accessed on 2010-02-05 from http://usacbi.files.wordpress.com/2009/11/economy_of_the_occupation_23-24.pdf

Reinhart, T. (2004) "Academic Boycott: In Support of Paris VI."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 被壓迫者劇場

一個公共社會學的形式？

by José Soeiro,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Estudantes por Empréstimo” (Students for Loans) 計畫於2010年5月舉行了論壇劇場，地點在葡萄牙國會的Senate Room。約20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參與，想出不論是立法的或是其他的解決辦法。他們在葡萄牙國王King D. Luís的畫像下演出。Carla Luís攝。

我們在2012年6月於Porto舉行的葡萄牙社會學會議中設置了一場「論壇劇場」，叫做「Estudantes por Empréstimo」(“Students for Loans” 反對“Loans for Students”，<http://estudante-sporemprestimo.wordpress.com/>)。我們演出一個活生生的故事：一名學生因為沒有獎學金，然後被迫要跟銀行借貸才得以完成學業。這個「被壓迫者劇場」計畫是從2年多前開始的，已經在許多學校演出過。

很多辯論和行動都由此開展，許多法案也從此延伸而來。這齣劇碼描述教育的成本，戲劇化地呈現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公共支出的刪減，以及就學貸款的普及，讓年輕人把未來借貸給金融體系。

看過之後，我們承認問題，指出癥結，然後開懷大笑。觀眾也開始熱烈討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故事到底是什麼意思，以及問題的根源。觀眾被一個角色 Joker 邀請進去戲劇之中，然後進行可能的問題

解決方案，看看他們可以作些什麼不一樣的事情？有蠻多人接受了這個挑戰。

> 當被壓迫者劇場和社會學相遇

論壇劇場是壓迫者劇場(TO)最普遍的一種形式，這也是一種劇場政治的方法，由 Brazilian Augusto Boal 所發明，然後在許多國家中都被實踐過。在葡萄牙的許多社區團體已經採用這種形式去思考其社區可能會面臨的困難。這個出發點是一個非常民主假設：人類不是動物，有一種普遍的能力，即有能力去觀察自身的行動。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每個人都可以演戲，都可以成為演員！1 無論我們即使是在另一個美學的空間中再現真實，我們成為行動者，決定我們所創造的真實。同時，我們也從當觀眾中獲得許多回饋。

在 TO 裡面，spect-actors (Boal 發明的概念，意味著同時是觀眾 spectator 也是演員 actor) 被邀請去打破舞台和觀眾之間的藩籬，觀看者和被觀看者成為一體。這種傳統的二分方式可以

>>

在許多思潮中發現，挑戰既有世界的正當性，也在劇場內外中進行批判。沒有人被限制在自己的社會角色之內。而去扮演其他角色的能力就是解放的最佳證明。

這是這場社會學會議的意外插曲嗎？或是剛好相反，事實上這是一種社會學的辯論和介入呢？而TO和公共社會學的關係又是什麼？彼此之間可以相互學到什麼？而困難又在哪？

社會學技藝和劇場一樣，是一種對現實的象徵性生產，也是再現和理解範疇的製造過程。兩者都和其他的學科、政治人物、媒體等一起競逐去再現這個世界。論壇劇場是一種對於真實的敘事，也是一種觀看世界的角度。論壇劇場總是可以呈現故事的不同面貌去作為互動的框架。而其中一項很大的挑戰是如何去如何讓結構性元素更加明顯地表達在劇場論壇中，也就是Erving Goffman所謂的互動秩序。社會學在這點可以幫得上忙。

社會學已經發展出許多重要再現的方法。透過觀念元素，在真實世界中並不能立即辨識出來的觀念，去再現社會。這些當然在劇場中相當有用，因為劇場中系統性的特徵和結構通常不太可見。在另一個層次，社會學也研究社會關係如何透過實作呈現，然後角色如何體現在社會之中。社會學可能會去挑戰劇場要思考如何讓角色、認同、行動、身體等呈現出被社會關係和權力所結構化。最後，社會學並不習慣去把個體故事和敘事視為不可化約的整體，而

是著重在其表達出來的關係。TO稱之為ascesis，就是一個我們把個體敘事粉碎化後，讓現象變成律則的過程。這就是社會學推論的基本方式。

➤ 公共社會學的媒介或是挑戰？

同樣地，TO或許可以成為公共社會學強大的媒介。作為更完整的人類語言，劇場可以把複雜度、脈絡、機制、互動等概念帶入社會如何被身體和空間所鑲嵌的辯論中。最立即的一個方式是這可以把討論帶入經驗中，所謂的Pierre Bourdieu的「務實理性」，去避免抽象的符碼，特別是對那些並不熟悉社會學語言的人。因為論壇劇場是在所謂存在與不存在（可以被spect-actor再現）的空間中展開，所以可以邀請我們去批判性地思考社會真實，以及其他可能性。在TO裡面，被壓迫者在從屬和反抗中存有著，每個一身體同時是宰制和解放的載體，而每一個重複動作同時也是行動的再生產和衍生的機會所在。

最後，TO是互動是的。用Brecht的話來說，TO可以同時是「啟發性與娛樂性的」，也讓公共社會學可以觸及到更廣大的公眾。對於觀眾來說，雖然社會學的討論並非立即的，但是這是一種邀請，觀眾被應請去觀看劇場，其可能比去參加辯論來得更令人興奮。這種方式至少也是一種經驗，呼應Estudantes por Empréstimo：比起之前傳統教育的方式去散播知識，劇場論壇可以召喚更

多的參與者加入。劇場不是裝飾或是表演而已，它是一種對年輕人的召喚，召喚那些對其他形式辯論有興趣的人的參與。

當然，受壓迫者劇場作為公共社會學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TO的核心其實是「去專業化」。這點和社會學相容嗎？即使如Burawoy所說得在社會學家和公眾之間去溝通知識？若公共社會學的任務是比揭露真相要更激進地在公共空間中去實踐社會學專業，我們怎麼處理Jacques Rancière所說的「永遠的醜聞」：民主是把平等當作目標，而非預設？換言之，公共社會學怎麼宣稱在專業思考和常識之間的地位差別？又同時怎麼去接受TO的民主預設：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權力和機會去發言？公共社會學可以忽略知識建構民主化，然後只致力於科學研究的普及嗎？可以讓社會學知識成為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所言的常識嗎？這些目標可以在不放棄社會學學科預設的前提下達成嗎？無論如何，我們總要試了才知道！■

> 危險卻僵化

葡萄牙的新社會運動

by Dora Fonseca,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無產階級的抗爭：標語寫道「唯有抗爭可以戰勝危險，搏節不是出路！」

在歐洲地區日漸升高的危機已經帶來了許多政府與社會的反彈聲浪。過去的公民社會有著很強大的能力去產生新的集體行動者，去對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威脅。而後面這幾年中，我們會發現這波抗爭政治有其週期性，並且讓我們質疑這種民主的正當性，喚起其他的議題，特別是勞工的危險處境。福利國

家和其目標的重建已經變成了共同的關懷焦點，也促成了新的集體行動者和舊行動者的轉變。

> 僵化的危險

葡萄牙所謂「僵化的危險」(Precários Inflexíveis, PI) 就是這樣的行動者。這項運動首先於2007年在首都Lisbon誕生，目標是繼續May Day遊行的成功動員。開創PI的集體行動者是一

種填補既有社會運動空缺的方式，繼續討論勞工的危險處境與其社會影響。PI從小規模的集體行動展開。這個行動叫做Ferve，反對獨立工作的誤用。Ferve也支持fartos d' estes recibos verdes，這句話可以被翻譯成「fed up with these green receipts」，green receipts的意思是獨立工作狀態，只那些和雇主沒有形式的從屬關係。法律上，這些勞

>>

工就是自己的老闆，並且預設著他們的安全和其他利益。不過，事實上他們都是從屬於其雇主的勞工，賺取薪水，並且無法享受應得的社會利益。PI 在 Ferve 上建立起來，不只強調「green receipts」，也討論各種形式的勞工危險。

PI 的創立和發展是遵循著 Sidney Tarrow 所謂定義的社會運動過程。第一，集體挑戰者的集結；第二，利用社會網絡、共同目標、文化框架；第三，鞏固認同，透過連結結構和集體認同去支持集體行動。集體訴求的提出在這裡特別明顯：譴責勞工危險，強調勞工面對的是不穩定的契約關係，並且重視個體生活的方案和職業。PI 也按照各種自主組織的傾向，迥異於傳統的政黨和工會。

PI 也呈現出了新社會運動的相似性格：很強的內部民主傳統；分散式領導；很高比率的非正式性；利益的個殊性；依賴網路科技的使用；創新的公共行動；分散的組織結構；不和敵人談判；團結作為目標；要求參與和直接行動。所以 PI 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從一開始網路科技的使用就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個網站：<http://www.precariosinflexiveis.org/> 是第一個 PI 成立的宣言。這個網站在他們發表「危險宣言」後馬上成立。在此，他們積極地定義自身為「在工作和人生中暴露在危險中的一群人」。他們紀錄所面臨到的危險處境。這些處境遍布各個經濟活動之中，特別是在公部門裡面。此外他們也強調他們在政治論述中的銷聲匿跡。

他們宣稱要重新喚起鬥爭，意味者傳統工會的鬥爭模式不再適合於現代社會了。還有，他們認為其處於「危險卻僵固」的泥沼裡面，所以要反對一切的勞動危險與無產階級化。

一開始的行動主要聚焦在譴責不公平和違法的工人處境。這意思是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以及臨時的勞動契約。他們也面臨到參與傳統工會組織的困難。這並不是什麼勞工運動沒有能力的問題，而是漸漸越來越多對於形式組織和制度政治的不信任所導致。其中一個主要的目標是建立新的認同：「危險的勞工」。這一步是有效動員反對去管制化勞動處境的必要條件。因此，透過 PI 的存在，中心的目標在於召喚那些處於相對不利處境勞工的危險認知和意識。透過動員新的意義，連結勞動危險對於效率的傷害（結盟其他國家或國際的集體行動），如此可以開創新的爭議和衝突的場域。他們一開始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去展示其特色，但是後來卻演變成高度的工具化和形式化，所以 PI 後來也變成了一個正式組織。

> 寡頭鐵律？

今日，所謂的「僵固的危險」正歷經著新的階段，進入新的「生命週期」。作為一個具有全國規模的組織，PI 現在正在形式化和合法化。這個從非正式到正式的轉變是一個合理的步驟，主要是為了成為勞工階級代表而取得正當性。有了合法的地位之後，選舉變成可能的選項，為

其代表的廣大勞動者發言，並且和其他的正式組織進行談判和對話。

儘管這個新的可能性來自於正式的組織模式，有一項議題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寡頭鐵律。寡頭鐵律可能會為 PI 帶來負面傷害，因為形式化的組織可能只會專注在組織結構的維繫而忽略了組織目標的達成。從自發性的抗議到組織形成事實上已經讓 PI 的有了轉面，變得較為保守。但是，有許多學者指出，像是 Alberto Melucci，官僚化是一個不可避免也不可逆的結果，也不必然讓組織原本的激進目標受到影響。另一個可能的替代選項是下一個月將進入政治季節，新的歐盟撙節計畫將會提出，也會有新的反對現況的社會運動出現。只有那個時候我們會看到真正的影響，以及組織正式化之後的轉變。

「僵固的危險」其實和寡頭鐵律是可以相互共存的。最佳的例證是看到在 2012 年 9 月 15 日的動員，成百上千的群眾在街頭上抗議，並且由非正式的網絡所帶起，反對撙節；或是在 2013 年 10 月 31 日上街抗議 13 年國家年度預算案的運動。他們反對最大的葡萄牙貿易聯盟；此外，我們在 2012 年 11 月 14 日發生的總罷工運動中也可以清楚看到這個共生性。

> 流沙中的社會學

第7屆葡萄牙社會學大會

by Maria Luísa Quaresma, University of Oporto, 葡萄牙



第7屆葡萄牙社會學會議於2012年6月19-22日在Oporto University舉行，由葡萄牙社會學會(APS)主辦。APS於1985年成

立，這個組織向來支持葡萄牙的社會學發展與知識傳遞。而過去的獨裁政府則把社會學視為是「不方便的學科」。1974獨裁統治結束後，民主時代來

熱情的新世代參加在Porto的葡萄牙社會學大會，2012年6月19-22日。

>>

臨，APS 的成立帶來了蓬勃的朝氣。從 80 年代末我們已經每 4 年舉行一次全國會議，將葡萄牙社會學社群齊聚一堂，並歡迎國外的學者一同共襄盛舉。

這次大會的主題是「社會，危機，重構」。這個主題很切合時代的氛圍，因為正值經濟與社會的動盪年代理，可預測性被不確定定性所取代，安全被風險所取代，希望則被恐懼取代。各種形式與主題的多元性吸引了來自各地上千位的社會學家，包括了 669 為發表者。其中 72% 從葡萄牙而來。我們必須強調這次大會包括了很高比例的外國社會學家 (19%)，特別是巴西。

6 月 19 日會前會即展開，標誌著年輕社會學家的創意。這個點子主要是組織與會者參與討論社會學生涯職業的議題，包括了就業市場和其他的就業機會。第一個主題由 ISA

的會長 Michael Burawoy 所主持，有 180 位青年社會學家出席。與傳統會議模式不同的是，以往常見的階層和距離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和 Michael Burawoy 對話」，並且從數個月前就由青年社會學家提出議題和問題。Burawoy 教授以科學知識的民主化、科學正當性被大型研究機構所壟斷、社會學介入公共領域的可能等論點去回應學生的提問。

在接下來的 3 天會議中，「社會與政治」、「社會、民主、價值」、「危機和政治觀點」等的全體場次吸引了許多公共人物和葡萄牙社會學家前來和公眾互動。這些座談場次辯論了學科最前沿的問題，並會科學知識生產和社會政治行動之間的關係搭起橋樑。國外和葡萄牙專家討論了南歐的政策，如經濟、工作、教育、健康、老化、社會安全、土

地與環境等，以及其後果。最後，我們還有許多主題場次，其中最受歡迎的是組織與專業、教育社會學、藝術文化與溝通、城市、農場與土地、全球化、政治與公民身份。

知識計畫的部份由廣大的文化和娛樂企劃所支持著的，包括了短片、學生劇場創作、音樂會 (Homeless Orchestra，由 Casa da Música 所支持)、書展。為期 3 天的會議氣氛在晚宴後達到最頂點。所以，辯論與討論最後的結論是：葡萄牙社會學仍然生氣蓬勃。然而，最難忘的還是我們看到了每一位社會學家都時時刻刻地在積極投入社會學這項志業，不曾停歇！■

> 台灣社會學

三波轉向

by 蕭新煌, 中研院社會所所長, 前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台灣

回顧過去，台灣社會學的歷史有其獨特性。雖然台灣在1895年到1945年被日本殖民，可是日本的社會學並沒有為台灣留下什麼得以傳承。此外，中華民國(1911-1945)在日本二戰之後接管了台灣，其社會學傳統也沒有移植過來。所以，台灣社會學的誕生始於1960年代，深深受到美國社會學的影響，在1960到1980年間依賴美國社會學的走向。而後在1980年代，社會學的「本土化」展開，伴隨著心理學和人類學的本土化運動，學者們開始反思過度依附美國社會科學典範的現象。從此，台灣社會學的知識地景開始變得不一樣了。

一開始，台灣第二代社會學家開始形成一股自我批判的共識。而這些學者多數是留美的，他們認為，儘管大家努力要理論化台灣的個案，但是台灣社會學缺乏紮實的本土經驗和脫離在地的現實。這些第二代學者訴求要「紮根」在鑲嵌於台灣認同歷史與文化的發展上。而後社會學者瞭解到了國民黨威權統治是社會學健全發展的最大阻礙，所以隨即展開了

「自由化運動」。他們呼籲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社會。這波自由化運動希望可以讓社會學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總之，從80年代開始，台灣社會學見證了「本土化」與「自由化」的雙重經驗，這不僅直接轉變了台灣社會學的性格，也間接影響了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遷。

更確切一點，這股「本土化與自由化」的運動在過去幾十年來有三波轉向。第一波是「溫和轉向」，目標是精確捕捉台灣的社會現實和社會變遷。一項重要的改變是「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於1984年開始展開。這項調查提供了非常高品質的資料數據。另外一個改變是出版了一系列的台灣社會問題分析書籍，迄今分別已在1979、1984、1991、2002、2005、2010等年度出版。這系列成為了非常可靠的學術與公眾的參考書籍。

社會學的第二波轉向是「批判的轉向」，旨在投入重要的公共議題上面。其中一個重要的改變是去挑戰國民黨的言論禁忌，從事三個領域的研

究：族群和族群關係、社會階級和階級衝突、性別和性別不平等。因此，在 1980 到 2011 年所出版的 160 種編輯書籍、總共 1133 個章節中，社會階級、社會流動、結構變遷等類似議題為最大宗 (214 個章節)；族群占第二 (131 個章節)；性別占第三 (78 個章節)。其他主要的研究計畫還包括了公民社會中社會運動的緣起與實踐。至今我們有 5 本重要的社會運動書籍，分別在 1989、2000、2006、2010、2011 年出版。

第三個轉向是「激進的轉向」，目的在讓社會學於台灣民主化中佔有一席之地。許多台灣社會學加在報章雜誌上投稿，組織或參與公共會議或記者會，企圖維護與增進台灣的民主價值。本質上，台灣的社會學從 1980 年開始就實踐了公共社會學，並推動台灣民主化了。為數眾多的台灣社會學家扮演起公共知識分子或

是運動者的角色，直接投入發起、動員、領導各種民主運動。

從 1980 年代開始台灣社會學和社會變遷的辯證關係，顯示出了在台灣歷經巨變的同時，社會學也展現了其強韌與旺盛的生命力。台灣社會與政治的轉變讓台灣社會學發展出了與台灣社會現實的緊密關係，鼓舞了社會學去挑戰威權統治，投身批判性的研究，甚至直接參與民主運動。台灣社會學不僅是一門自由解放的學問，同時也促進了台灣的民主深化。■

> 小國社會學的困境

以台灣為例

by 黃樹仁, 國立臺北大學, 台灣

台灣在大約 60 年前，社會學的博士寥寥可數；而今日台灣的社會學已經成長為擁有約 300 名博士的規模了。台灣社會學不僅在學術上有大幅的進步，在公共政策上也貢獻良多。此外，對於理解台灣這個快速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的國家，台灣社會學也邁出了一大步。

不過，台灣社會學在理論和方法上也面臨到了挑戰。由於台灣的人口規模和學術資源決定了現今這個小型的學術社群規模，所以為社會學帶來了限制。這個限制也很可能加諸在其他小國和其他社會科學上面。

今日的社會學就像其他學科一樣，高度的專業化，被切割成好幾個次領域，而每個次領域也包括了很大的研究主題。如此專業化的學科其實是需要好幾年的理論與方法的訓練，才可以使一位研究者針對一項議題從事有意義的研究。只有 300 名學者的學術社群意味著許多次領域只能找到很少的研究者。因此，許多議題長期以來被忽略了。

當台灣社會的諸多面向被忽略之後，我們對社會的理解就有許多空白模糊處，這也回過頭來影響了社會學的學術研究。若沒有足夠的本土研究來提供給整

個社群去參考引用，我們的研究和教學只能被迫依賴國外的學術資源。因此許多本土問題我們只好去用猜想的。如此一來許多關於重要的台灣社會面向知識多半是用猜的，而非經過紮實的學術研究。而學術作品的讀者一般來說也無法區辨什麼是用猜的、什麼是學術研究的成果。

即便是那些廣受注意的次領域，其研究者也只有個位數而已。文章出版則不頻繁且緩慢，若是不幾十年一次，也要好幾年才有文章出現。甚至在最受歡迎的領域中，通常也要等上好幾年也可以看到文章被引用或評論。實質的對話有如夢境般的遙遠。從事學術的孤獨是常態；最傑出的研究者也常常會因為這種缺乏交流的情況而感到挫敗沮喪。

更糟糕的是，對話的付諸闕如不利於文章品質的檢視與校正。最極端的情況可能是有問題的文章卻是長期以來本土的唯一作品，其內容可能只是一般的常識性論點，很容易產生誤導。

當還有太多的主題沒被好好研究或是被誤解時，被研究最透徹的領域也可能受到波及。原因很簡單，就是作研究不可能無中生有。我們總是以前面累積的知識為背景和基礎去從事研究。唯有前

人的研究成果，我們對於資料的詮釋和解讀才得以可能。若這個知識的根基太過於薄弱、不穩，在怎麼用功的研究者也會暴露在錯誤解讀資料的風險下。易言之，這無關乎研究設計得好不好，資料全不全，分析得仔不仔細。只要前面累積的知識有所缺陷，後續的研究很難不繼續出錯。

此外，在地研究的缺乏也讓原創性的觀念和理論難以形成。但這對於分析本土社會的特殊性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每個社會多少都有其特殊性，並且很難被外來的理論觀念所精確捕捉。在這個常見的情況下，為了理解自身所處得社會，除了本土資料之外，本土的概念與理論也是必要的。可是台灣很顯然就是不夠多的學者可以去從事這項工作。即使少數特別幸運的領域中有學者可以發展出原創性的本土理論，這些作品也很少被同儕學者所引用和注意。加上外國期刊的理論源源不絕的進口而來，其背後有著成百上千的學者背書，本土理論因此就更難在國內找到跟隨者了。儘管「本土理論」聽起來很時髦，可是現實上這個學術市場根本沒有足夠的人力規模、相互引用、信譽去支撐本土理論

的建構。結果就是台灣社會學變成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大家複製生產類似的研究，把本土資料用外來模型套用解釋而已。

好，那我們除了悲觀，還可以作些什麼？我認為要去思考社會科學在各種公共政策裡的相關性與價值，去審視因為知識缺乏而導致錯誤政策的社會代價，以及我們對於投資社會科學的責任所在。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成我們對於社會的認知是有限的，更積極努力地去累積更廣泛的知識，並對於科學解釋有更多的自我反思。■

> 智利的道德議題和個人自由

by Oriana Bernasconi, Universidad Alberto Hurtado, Santiago, 智利

「所謂共同道德的概念並不精確；或者，並非一成不變」

(Seyla Benhabib, 2004)

智利在過去幾十年來歷經了健康、教育、福利、勞動市場等的改革。這些改革的確帶來了更包容和平等的改變，不過要努力的地方還是很多，許多具有挑戰性的議題，像是個人自主、經濟平等、政治參與、反歧視等，還有待解決。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是需要面對這些議題的，而社會科學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有助於幫我們處理那些社會爭議，減少冷漠、誤解、和不信任。

在智利，社會議題的爭議包括了道德的面向，我們稱之為「價值爭議」(disputas valóricas)。公共辯論的議題圍繞在安樂死、離婚、墮胎合法化、以及性少數等等。智利社會的許多爭議議題都和法律有關，這是因為許多法案事實上市需要考慮公民的責任和義務的，而這關乎著整個社會的道德文化。整個辯論是反映了善、公民、分配等的核心規範價值，此外還包括了道德規範的來源與程序。

在民主復甦之後，智利社會也開始關注不同的改革如何擴大個體自由和減少公共對於個體的干預。在多數西方國家，若墮胎等議題先發生、而後是安樂死的話，在智利則是於 1990 年代開始討論性教育、為期長達 9 年的離婚法案辯論 (2004 年才通過)、以及 6 個規範如何「尊嚴地死亡」的法律、然後是安樂死 (2001-2012)。這些辯論至今仍持續進行著，並且聚焦在性少數和事後避孕藥。

社會一旦進行這些關於個體自由和反對

歧視的辯論，其實就是展開政治議程的辯論。但是智利的某些人將這種需求視為是成熟道德社會的表現。相反地，也有一些人認為這是道德衰敗的象徵。

我曾經重建了這些辯論的論述過程，聚焦在安樂死和尊嚴死亡等案例。這是一個充滿法律與道德意含的辯論。近期的發展已經到了生物和生醫的領域，開啟了許多介入、操作、延長、改進人的生命的可能性，並且重新定義了生命本身。安樂死、試管嬰兒、代理孕母等都讓我們繼續辯論這些社會與科技的爭議，並且擁有類似的論述結構，以及相似的道德挑戰。

這些辯論的分析反應出了兩種道德原則的衝突：病患的自主和生命的不可侵犯。那些支持安樂死的人士認為病患處於極大痛苦和不可回朔的病痛中，是可以合理要求醫生安樂死的。而反對者則在醫療脈絡之外呼籲消極的安樂死以及不施加必要的醫療行為。但是這個辯論遠遠超出了去合理評價兩種道德原則的重要性以及法律對於真實情況的描述方式，像是死亡的本質和幫助自殺、一般或是額外的醫療行為等都沒有被討論到。所以，爭議所包括的不只是公民價值的爭辯，也是科技事實的社會政治建構過程。最後，這更是一個科學和道德相互交織而成的「晚現代性」(late modern times)。

1 I interview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and bioethicists involved in the controversy, studied the legal proposals and their discussion in Parliament, and examined coverage in academic articles and newspapers.

> 智利環境政治的侷限

1

by Alejandro Pelfini, Universidad Alberto Hurtado, Santiago, 智利, LACSO-Argentina



在智利的Patagonia抗議水力發電水壩的興建。

2 011 年智利突然之間變成了舉世矚目的焦點：反對高學費和不平等教育的學生運動獲得了大量的關注。更廣泛而言，那一年度標誌著社會運動和公民政治化的蔓延，反對被動地接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侵襲。這個新政治運動不只是學生運動，還是代表著各種典型社會議題的爭議與分歧。原住民自主的

權利以及某些公共地區的保留等，都是環境的資產，也號召了許多其他公民的關心。

各種的抗議在地區蔓延開來，一直到首都 Santiago，反對在智利素負盛名的地方建立大規模的水壩 (Hidro Aysén)。大型的公民抗議運動也開始質疑環境政策的正當性，以其資源政策和相關的非永續經營政策。在這個意義上，

>>

智利是第一和最成功的新字由主義實驗國家，成為了半邊陲國家環境現代化的典範。

智利的環境政策不到10年。它從南太平洋的鮭魚繁衍危機開始。本質上這是個自然反應，但主要的行動是在這之後，也就是說，政府並沒有對後來的公共政綱做出貢獻，反而是替之前投資開發計畫背書。政策被當作是資源開發的正當性來源。鮭魚繁衍，木材，礦產等是智利的主要出口品。這些是環境管理的目標，並且附帶另外3項細節：資源保護（而非環繞於生態系統）；社會和環境之間衝突的控制；投資開發者利益的保護。環境政策因此著重在這些開發資源上，並且和3個主要行動者有關：投資者（通常是跨國企業）；

國家；專家（智庫或是環境評估公司，提供科學正當性給開發方案）。這些行動者透過一個網絡連繫起來：精英之間的聯合，主宰環境政治，而公民則淪為觀察者。

我的計畫是試圖去分析這個網絡怎麼被鞏固的。更大的脈絡是主導論述（通常是企業社會責任），和組織起來的各種特權制度安排（自願同意），以及利用環境評估指標去正當化與再生產其環境政策的主宰性格。總之在這個脈絡之下，進步民主的理想，例如課責性、透明性、參與性等被化約成只是國家、市場、公民社會分工的工具，如此去推廣更彈性的擁有權和自我管制。集體學習開啟了某些民主化的契機，但只是以「被監督的學習」的形式出現。所以，這裡的

問題在於是否如此的限制是導因於化約的工具化，並被企業與精英聯手主導？或是理想價值（課責性、透明性、參與性）等其實是不夠進步與民主？更敏銳和積極的公民會把更有創意的問題帶到公共領域中，把政治從既有制度泥沼中拉出來，帶到街頭上，吸引鎂光燈。



> 智利Santiago 的移民

by Carolina Stefoni, Universidad Alberto Hurtado, Santiago, 智利

在智利Santiago服務秘魯和哥倫比亞移民的超市。



Santiago 是智利的歷史城市中心，也是最大的移民都市。此處有大量從拉美其他國家來的移民，多數是秘魯。這些秘魯移民發展出了密集的商業活動，主要販賣服務給國外遊客，像是廚具，甜點，客服中心，貨運，以及匯款服務。

在這個發展的背後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因為居民持續的從市中心移走，所以有許多的老房屋，店面空出來。也因為這樣，移民就因此聚集，把房間轉租給人。此外，也有秘魯產品公司的成立，讓許多移民可以很快的進入狀況。另外像是在 Consert-

>>

Santiago的購物中心成為移民的活動中心。



ación 政府執政期間（中間偏左的聯合政府）也讓移民正規化，讓他們可以進入正式的經濟體系中。

在此我想要強調 3 個重點。第一，移民勞動和經濟之中，正規和非正規的實作常常是重疊的。當事政府企圖要減少街頭經濟活動時，許多正規的商店還是照樣進行非正規的交易，例如在街上販賣，無契約工作，無照販賣等等。這樣的地下經濟活動是一種增加收益的策略，導因於市場的高度競爭和低價獲利。

第二，這個都市是移民社群的認同形構的參照點。這個空間在移民社群之間可是非常有名的。不論是對其他居民或是移民母國的社群來說皆是如此。這個城市是一個具有相同經驗的外國人的會面地點。

第三點則和這個城市的地理位置有關，以及如何影

響到了此地區的意義與型態。事實上，Santiago 作為歷史都市的中心意味著種社會關係在此交會，像是工作、旅遊、公共服務等。這樣的社會網絡交織出了 Santiago 的邊界、意義、特色。

的確，移民在這個地理中心上的生活方式也帶來的意義與再現，並且和其他的意義與再現之間是有緊張關係的。在此可以舉 2 個例子。第一，這裡其實是重要的都市地點，因為國家政府大樓、法務部、各個行政部會等皆位於此。這也是獨立宣言誕生之地。所以，這樣的歷史與民主的重要性對外國人來說並非如此。

第二，這裡也有一個全球都市的議題。這是一個更現代去再現 Santiago 的方式，也被市政府積極推廣。這包括了去推行乾淨、安全、有秩序的都市形象，作為國際交易中

心，並且利用警察去管理監督都市中心。如此一來，移民就顯得格格不入。

移民及這個空間帶來了許多論述上的爭辯與爭議。但這些也正代表了這個都市的特色所在。■

> 國際化社會學的挑戰

by Eloísa Martín,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巴西, Current Sociology 主編

最近全球高等教育制度有了一個共同的需求：國際化。為了達到此一目標，大家都想成為最前面的幾名：努力發表到影響力指數很高的期刊。在過去 30 年來，這個目標被視為是學術的核心價值，而且社會科學更是如此。同時，發表到國外期刊被和發表到英語期刊劃上等號。所以像是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德文等期刊都只有特定區域的讀者，也不被認為是國際期刊。英文的優勢，作為全球的學術語言，更是助長了這個潮流。

然而許多期刊只所以被標榜為「國際期刊」只是因為他們排名很前面，有很高的影響力指數，是用英語而已。但事實上他們一點也不國際！就像 Tom Dwyer 在 ISA 的 2009 年國家會議中指出的一樣，事實上英語期刊一點也不等於國際期刊。¹ 北美或西歐的期刊關心發展國家的社會，這並不是壞事，可是問題在於那些全球南方的大學和機構要求其人員一定要發表在這些他們認為是國際的期刊上，這使得那些非主流的學者進退兩難，結果就是使得許多社會學家身陷困境。

面對這個假的國際化需求，或許其本身有些重要性，可是這也深深影響刻劃著我們這個學科。我想有 3 個可能的回應方式。第一，高度的在地主義，不論在國家或是地域的層次，學者都拒絕在國際場合發表。這有時表現在極度複雜的對於期刊評比系統的批判上，有時也表現在文化主義上，結果就是只發表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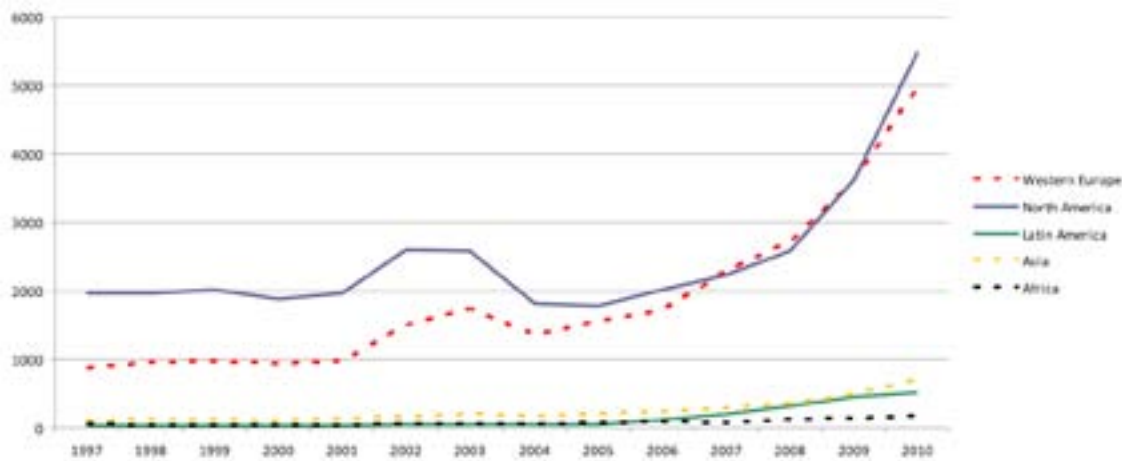
術文章。這個特殊主義的優點在於可以深化某些特定問題的討論；可是，壞的結果是無法和其他領域觀點進行對話，進而窄化了知識的理論化潛力。

第二個回應是接受這個國際發表的壓力，並且把此當作為一的學術目標。如此一來，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非主流學者拼命吸收主流學者的問題、理論、方法，並且甚至模仿寫作風格。奇特的是，非主流學者並非總是可以達到目標，或許是因為他們沒有避開模仿的陷阱吧。寫個完全學術味的文章會可是會使學者喪失原創性和切題性的！努力把在地的分析和主流理論結合和符合主流格式成為了「Procrustean bed」(譯注：希臘神話中的一種床，若睡在上面的人高過於床身，把腳鋸短；反之則把腳拉長)。

第三個回應是對話。作者、機構、期刊等會承認在地的特殊性對於學術問題、理論辯論、寫作風格的重要性，並且同時可以把國際發表視為是各國社會學發展和茁壯的一扇門，也把這個機會視為是全球社會學知識社群的共同努力方向。這就是 Current Sociology 和 ISA 所希望的！

全球社會科學報告 (UNESCO, 2010: 153) 指出發表的國際化其實是對先進國家有利的：像是歐洲和美國。事實上，有超過 80% 的期刊是以英語發表，然後 2/3 是在以下這些國家的期刊上：美國、英國、荷蘭、德國。同時，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各只佔了不到 5%

以作者的區域為劃分的期刊發表分佈。Source: SCOPUS



(UNESCO, 2010: 143-4)。

若我們觀察在前幾名的期刊 (SCOPUS)，我們可以看到多數作者來自於西歐和北美的學術機構，亞洲和拉丁美洲則相當有限 (亞洲數量成長中)，然後非洲幾乎是零。²

Current Sociology 也很難自外於這個潮流。從 1999 到 2009 年間，72% 的文章是由歐美學者發表。³ 這和其他主流期刊很像。亞洲和澳洲分別佔了 8.1% 和 5.3%。此外，超過半數的作者來自下來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澳洲。

但是，有個有趣的是：Current Sociology 發表了 6% 的拉美學者的文章，3.2% 的非洲作者文章，2% 的中東作者文章。我們離理想的數據還很遠，不過同時我們可以驕傲的說，Current Sociology 已經廣開大門給非主流學術社群，很努力的要達到內容和地理區位上的多元性。

Current Sociology 從 1952 年建立以來就一直朝著多元的目標邁進。這份期刊接受任何語言的研究計畫，同時這也是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的政策。此外，它也接受各種非主流的新的議題、理論、方法等，而且還包括了寫作格式的創新。這份期刊也致力於社群間的對話，讓在地的分析可以讓更多國際上的

讀者接觸到。的確，在這過程中，在地的特殊性或許多少會流失，不過分析的複雜度並不會。而和世界各地學者辯論的可能性也讓 Current Sociology 的作者和讀者皆能受惠！■

1Dwyer's comments can be seen in the video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 a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A5GaEPQcZ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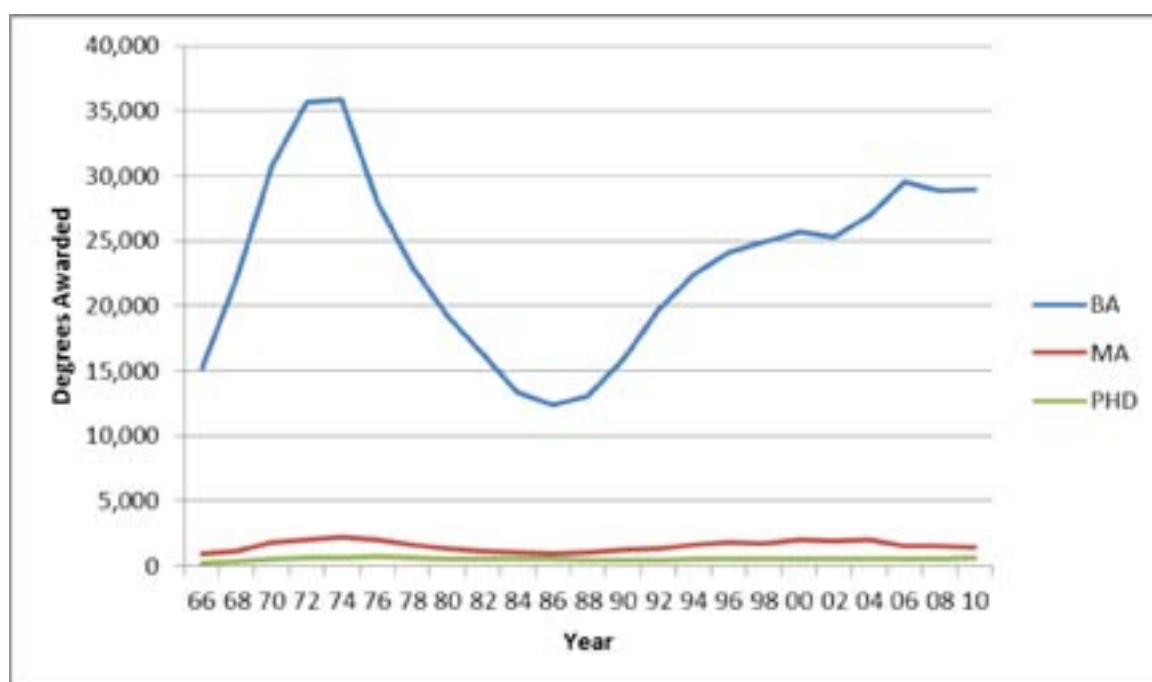
2 I would like to thank Matías López, editorial assistant at Current Sociology, who came up with the data for this chart and created it.

3 More details an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his survey of Current Sociology can be found in Eloísa Martín (2012) "Making Sociology Curr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A Collective Task." Current Sociology 60(6): 832-7.

> 美國社會學沒落中？

by Bronwen Lichtenstein, University of Alabama, Tuscaloosa, 美國, RC49會長(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Sociology Degrees Awarded by Degree Level in the US, 1966-2010.
Source: ASA, Research on Sociology 2012.



美國社會學的現況是什麼樣子呢？1994年時，我剛從紐西蘭移居到美國的Alabama。那時我就聽說美國社會學正在沒落中了。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的社會學博士班最近才被裁撤掉而已，而且教授和管理階層為此起了很大的衝突。而社會學輔系也被併入犯罪學系，我現在可是在這個系教書。從這之後，重新恢復社會系的聲音不見了，社會系的輔系也因為課程太少而難以支撐下去。從我的觀點看來，美國社會學的確前途堪慮。

美國社會學前途為何？這樣的問題我以前從未想過。不過直到我看了這

篇 Benjamin Ginsberg 的 2011 年的書：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他這樣說道：「精確地說，這個命運[每況愈下]已經讓許多美國大學的社會學系所岌岌可危，因為學生不再對社會學感興趣了。」

Ginsberg 的命題讓我去查詢了美國社會學會(ASA)的網站，想知道美國大學社會系的走向。其指出，社會學得學士和碩士學位，在1990和2004年間成長了兩倍。一項在2001和2007年的更新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成長還在持續著(Spalter-Roth, 2008)。獨立的社會系

>>

數量也增加了。這可能是因為學生人數成長的關係。

ASA 也指出了 3 個警告：首先，博士學位並沒有和上述的成長同步，甚至在 2000 年代初期減少，而後才又稍微成長。第二，犯罪學的集中化導致了傳統社會學的式微。第三，終身職教授的缺很少，但學生卻增多。大學喜歡僱用臨時或是全職的講師，這是因為他們的經濟考量，但這大大影響了社會學這門學科 (Wilson, 2010)。

或許還有一絲曙光吧。ASA 的報告可以從美國社會學更廣泛的趨勢脈絡下來理解：1970 年代其實是社會學系所成立的最頂峰階段，全國的社會系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但是到了 1980 年代，社會學的學生人數學位量開始快速減少，許多人增預言那是社會學的末日 (Summers, 2003)。Dunlap 和 Catton (1994: 11) 把這個衰落歸因給 80 年代的市場基本教義派抬頭和雷根政府對社會科學的「severe attacks」，這使得學生對社會學失去興趣。這次的下滑相當多，社會學規模至今都還追不上美國的人口成長速度。

Ginsberg 所言之「學生對社會學失去興趣」或許是對的。不過，我想還有其他的因素，那就是就業市場的極度不穩定。容我再重申一次：我們有一個趨勢是大量授予專業而非學術的學位，這或許是經濟而非意識形態的考量。學生若想修社會學，他們第一個問題一定是：「我之後可以作什麼工作？」我總是回答：「噢，很多啊！」然後繼續解釋社會學為什麼有用。但是，從我的社會學教學經驗來說，連社會系都會被撤掉了，所以社會學有用在哪？嗯，我也想知道。

幾年以前我調查了 1000 名的犯罪學系和社會系的大學生，問他們社會系是否應該存在於大學中，答案很明顯是肯定的。所以，我想學生失去興趣並非是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其他像是父母認為商業、工程、醫療、教學等學位比較容易找到工作，這可能更為關鍵。無論如何，社會學在 2012 年還是沒問題的。

我們或許不像其他專業學位一樣可以有讓很多學生想拿到這個學位，不過傳統社會學還是有其地位在，像是批判性思考，博雅知識，公民教育等。我對於美國社會走往功利主義的另一端這點而言，我可是很樂觀的。■

Referenc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12) "Research on Sociology: Sociology Degrees Awarded by Degree Level 1966-2010." Retrieved November 29, 2012 (http://www.asanet.org/research/stats/degrees/degrees_level.cfm).
- Dunlap, R. E. and Catton, W. R. Jr. (1994) "Struggling with Human Exemptionalism: The Rise, Decline and Revit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25(1): 5-30.
- Ginsberg, B. (2011) *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alter-Roth, R. (2008) "What Is Happening In Your Department? A Comparison of Findings from the 2001 and the 2007 Department Survey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http://www.asanet.org/images/research/docs/pdf/Whats%20Happening%20in%20Your%20Dept.pdf>).
- Summers, J. H. (2003) "The End of Sociology?" *Boston Review* 28(6).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http://boston-review.net/BR28.6/contents.html>).
- Wilson, R. (2010) "Tenure, RIP: What the Vanishing Status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2 (<http://chronicle.com/article/Tenure-RIP/66114/>).

> 巴爾幹化之外的 巴爾幹島

by Svetla Kolev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 and Knowledge, Sofia,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社會學會會長



Ohridski於2012年11月9日舉行第二屆巴爾幹半島社會學論壇。Hassan Berber攝。

雖然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巴爾幹半島被和區域衝突分裂等名詞劃上等號，也因此有了「巴爾幹島化」，不過，在第二屆的巴爾幹社會學論壇會議上(Sofia, 2012年11月9-10日)我們看到了巴爾幹的嶄新面貌。巴爾幹社會學論壇於2011年11月在Tirana成立，由一群阿爾巴尼亞的社會學

家，特別是Leke Sokoli，以及由馬其頓，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等地的學者所共同建立。這是第一次巴爾幹島社會學的制度化。此構想源自於1990年代由保加利亞社會學會會長Peter-Emil Mitev所提出。不過由於南斯拉夫戰爭，這個理念遲遲無法被落實。在瞭解到了歷史教訓和相互合作的必要性之後，巴爾幹島

>>

社會學家知道唯有共同努力，彼此才能相互成長。所以，這群學者在 Sofia 成立了一個相互溝通的對話平台，試圖想更瞭解彼此，讓陌生成為熟悉。

當然，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巴爾幹的社會學家與社會科學家舉行過了許多次的會議，來自各國的學者討論各種議題。像是這次 2012 年 11 月的 Sofia 會議就是討論巴爾幹島如何對社會學產生社會和認識上的挑戰。

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巴爾幹的鄰國，是經濟或是政治的夥伴，是階層畫得社會或是整體的社群，是教育或是文化的結構？這些都是為了共同生存和相互承認的方式之一。而過去的歷史又怎麼影響了各國的現在走勢？當代經驗可以提供給鄰國作為參照嗎？若是如此，那作為歐洲和世界的一員，我們的經驗是具有建設性、相互性、啟發性的嗎？而彼此同時是夥伴也是競爭者的身份，我們所扮演的非霸權角色以及在面對知識立即的適用性時，又要怎麼維繫自己國家的社會學傳統、關注在地問題、符合知識的有效性？總之，我們巴爾幹島國家的社會學可以在巴爾幹化之外產生出普世性的知識嗎？

這些問題則由 6 個主題場次和 5 個主題座談所共同集結而乘。參與的社會學家則超過上百位。來自巴爾幹島各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科索沃、馬其頓、羅馬尼亞）以其西歐和北

美各國（加拿大、芬蘭、法國、比利時）。因此，對話並不侷限在巴爾幹島各國的學者之間而已，而是世界各國皆有之。

此外，這次的 Sofia 巴爾幹島社會學會議也呈現出了一幅社會學所熟悉的圖像。制度可以為個體和組織開創必要的自我實現條件，只要制度中的行動者有清楚的制度目標和職志；此外，個體可以成為制度的動力來源，前提示後者可以認可個體和組織的努力是可以以為制度的發展和創意帶來貢獻。而 Sofia 會議的和作和對話意願可以被實現，也有賴於 ISA、巴爾幹研究學院、Sofia 大學、保加利亞法國研究院、保加利亞研究院知識與社會研究所、以及巴爾幹社會學論壇 (BSF) 的補助和支持才得以可能。

巴爾幹社會學的合作也直接承襲自 2011 年於 Tirana 舉行的會議經驗，這使得一年後 Sofia 會議得以可能。這樣的學術對話傳統也將交棒給 BSF 的第三屆於馬其頓舉行的大會 (2013 年秋季)。每年將由各個國家輪流舉辦。我想，一個更好的形式或許是建立在「橋與門」(Simmel 的著名比喻) 之上：發展向外探索的視野，跨越國家疆界，搭起通往世界的橋樑。■

> 科際研究： 菲律賓社會學會會議

by Clarence M. Batan,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Manila, 菲律賓, RC34 (Sociology of Youth)主編



菲律賓於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在2012年19日舉行社會學會議。左起Clarence Batan (PSS會計長), Emma Porio (ISA執行委員), Michael Burawoy (ISA 會長), Filomeno Candaliza (PSS副會長), Leslie Lopez (PSS秘書), Filomeno Aguilar (PSS會長), Gelia Castillo (國家科學家), Stella Go (PSS執行委員)。

2012年10月19-20日，菲律賓的社會學家、實踐者、學生等，以及鄰國的代表於菲律賓社會學會 (PSS) 和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ADMU) 共同主辦的2012年大會上齊聚一堂，在Quezon City進行交流。約有100名的參加者與會，他們從各地的

>>

大學或是 NGO 組織前來，一起討論「社會學和科際研究：可預見的未來？」這個主題。

PSS 於 1952 年設立，是菲律賓的專業學術組織，走過了 60 的年頭，和國內外的社會科學家一起積極參與知識社群的建立。這次的會議主要目的是檢視社會學得跨學科性。Filomeno V. Aguilar 是 PSS 的會長，他在會議中總結道：「社會學作為一門學術，有些領域必須具有核心的地位，並且維持其專業性；然而，其學者卻認為我們的日常生活被在地和全球的各種力量所結構形成一個相當複雜的系統，很難完全掌握，除非我們借用其他學科的工具才行。」這個總結可說是為了為期 2 天的討論和辯論立下一個穩固的基礎。

ISA 的會長 Michael Burawoy 發表了主題演說，題為：Interdisciplinarity: The Promise and Danger。Burawoy「鐘擺之外」的技巧，讓全體與會者驚豔不已。他提出了許多基本的概念幫助我們去批判地思考跨學科性的問題。這個概念引起了 3 個場次、5 個平行討論，總共 35 篇論文的討論。

另外一個相似的會議重點是作者論

壇。這些作者包括了 Erik Akpedon 博士 Czarina Saloma-Akpedonu 博士和 Filomeno V. Aguilar 博士。各個場次涵蓋了歷史社會學和社會史學家；論壇也由著名的社會學家，Fr. John J. Carroll SJ 所主持，討論了他人生作為一個「牧師/社會學家」的矛盾修飾法。此外也出版了第 60 期的菲律賓社會學期刊，主編是 Filomin Guetierrez-Candaliza 博士和 Maria Andrea M. Soco 博士。書籍展示、美食、創意主題是由 Emma E. Porio 所負責 (ADMU 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系系主任) Leslie A. Lopez (PSS 秘書) 所負責。

今年的 PSS 會議不僅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場合讓菲律賓的社會學家參與，讓年長與年輕世代進行交流，此外也賦予的社會學一個更具有意義、更與社會貼近、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更加務實的較色。全球問題導致了新型態的衝突、面對、轉變，因此以菲律賓為基礎去連結全球南方的學者共同關注相關的問題，可說是全球南方的新社會學研究進程。這個進程則由新生代的社會學家，和各個學科之間的合作，進行科際研究，積極參與在地社群，放眼全世界。■

> 社會學與社會轉變 第11屆SPSA會議

by Leslie Lopez,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菲律賓社會學會秘書



Emma Porio, 主辦者，舉辦在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的兩場會議。這是在亞太社會學會的早餐會場。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的菲律賓文化院和社會學與人類學系所負責的第11屆亞太社會學會議 (APSA) 圓滿落幕。這場會議在去年2012年10月22-24日舉辦。此屆的主題是「亞太地區的社會學與社會轉變」，共有260名與會者，來自23個國家，遍及亞洲、非洲、美國、歐洲以及太平洋地區。

邀請的演講主題包括了公共社會學、南方理論、性別、領導、知識動員等，分別由著名的社會學家主持，包括了Burawoy (ISA 會長)，

Raewyn Connell (University of Sydney), Dang Nguyen Anh (越南社會學院), Vineeta Sinha (新加坡國立大學), 蕭新煌 (台灣中央研究院), Surichai Wungao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Emma Porio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Filomeno Aguilar, Jr. (菲律賓社會學會會長,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Maria Cynthia Rose Bautista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菲律賓)。

為期3天的會議共有60場座談和180篇論文。而且議題涵蓋了各個層面，像是性別、宗教、全

球化、教育、氣候變遷、科技等。最後的全體出席場次是「亞太地區社會科學社群的參與」，由Michael Burawoy 和 Emma Porio 所主持，此外還有其他國家的代表：Yazawa Shujiro (日本社會學會), Dang Nguyen Anh (越南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Ruchira Ganguly-Scrase (APSA), 謝斐宇 (台灣社會學會及中央研究院), Mohamed Tavakol (伊朗社會學會), Vineeta Sinha (新加坡國立大學), 和 Surichai Wungao (泰國社會學會)。

> 全球行動與在地憤怒

by Benjamín Tejerina,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西班牙, RC48會長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SA執行委員, 2010-2014



一處在Barrio de Lanús的廢棄工廠成為公民教育中心(Buenos Aires, 阿根廷)。Benjamín Tejerina攝。

集體行動與社會運動的研究在近幾十年來相當蓬勃，大大增進了我們對於社運的產生、鞏固、影響、衰落的理解。而社會學也發展出了許多新的工具去研究這個有如變色龍般的社運經驗。

從2010年12月開始，我們看到了一連串的抗議產生，也看到了一系列和平的佔領運動。這些行動主要針對不民主以及威權政府而來。像是突尼西亞、埃及、摩洛哥、葉門、巴林、以色列、西班牙、美國等國家都相繼出現了佔領運動。在某個意義上，這些和平的抗議可以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變遷，不過也有越來越暴力化的傾向。各地抗爭的結果並不一致，專家也睜大眼睛在觀察著。總之，這些運動透過網絡快速蔓延開來，也透過網路影像的傳播增大了影響力。Manuel

Castells說得好，這是一個「網絡化的社運時代」。

為了檢視這一波運動風潮，RC48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Change) 和 RC47 (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名為「從社會到政治：動員和民主化的新模式」(From the Social to the Political: New Forms of Mobi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會議舉辦在2012年2月於Bilbao舉行。論文探討了在北非、阿拉伯國家、南歐等地的新運動，並由Uni-

>>

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出版。讀者可以從此下載：
http://www.identidadcolectiva.es/ISA_RC48/

去年對於 RC48 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因為我們在 ISA 第二屆 Buenos Aires 舉行的社會學論壇，辦了將近 20 場的討論、以及圓桌會議。這些場次開啟了許多契機，像是學習社運與社會變遷的新理論取向，探索創意、情緒、身體等在抗爭中的角色，分析不正義與排除的視覺再現，理解科技、社運之間的關係。最後，更重要的是，我們聽見了拉丁美洲街頭的激進聲音！

在這裡我想要強調這些論文的理論貢獻。這些論文研究了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玻利維亞、厄瓜多等發生的抗爭行動，包括了 piqueteros 運動、學生運動、殘障運動、政治受難者運動、黑人青年運動、無土地勞工運動、無殼蝸牛運動、勞工階級的都市抗爭、關廠工人的抗爭、原住民抗爭、人口走私議題等等。Buenos Aires 的會議讓我們坐下來面對面地討論那些鮮為人知的抗爭活動。不只是拉丁美洲的案例，其他對於民主化和社會正義有重大貢獻的案例我們也都仔細探討。

最後我們要感謝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和 Gino Germani Institute 的協助聯繫復廠工人和草根組織工作者。這些文章可以在專書中找到：Global Movements, National Grievances: Mobilizing for “Real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by B. Tejerina and I. Perugorria)。

> 聯合國的青年參與

by Jovanni Rodriguez,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New York, 美國

2012 年我代表 ISA 成為第一位聯合國公共資訊部的青年代表，主要關於聯合國的青年意見的需要。會議中大家討論、辯論各種議題，而且觀點也隨著國籍、種族、性別等大不相同，不過，年齡卻是長期被忽略的面向。因為很多爭議性的問題關乎著重要決策與改革，所以若忽略了年齡，那聯合國的決策後果可是會相當嚴重。把青年意見納入，對於一些重要的 NGO 和聯合國的事務推動來說，絕對有正面的影響。年輕世代也可以幫助那些運動者藉由接觸和面對公眾，傳播訊息，去爭取其訴求的達成。

2012 年 3 月我參加了 DPI/NGO 的簡報會議，內容是關於 Felician College 的學生利用飲用水的衛生去提昇性別平等。雖然青年朋友的報告讓人很振奮，不過當報告提及 Facebook 的使用時，在場觀眾似乎在狀況之外。例如什麼叫做「pull out」？有位年長女性就說：「我甚至不知道怎麼傳簡訊呀！」在年輕人使用社群媒體去實踐 NGO 目標的同時，這場會議顯然

在他們的預料之外。

社群媒體可以在帶給 NGO 很大的幫助，所以把青年朋友帶入聯合國是很重要的。不過，同時我們也要想他們和議題的關聯性。例如其中一場討論了兒童的性問題，因為那些 NGO 想把兒童的性教育列為基本人權。當我們現今仍然存在著對同性戀和性教育負面意見時，我不難想像這樣的會議很難吸引像我這個世代的人。有兩種東西會讓我們興趣缺缺：無聊，說教。

把這隔絕 NGO 和年輕運動者的隱形高牆拆除，聯合國將會擁有兩股強大的力量，繼續讓人道主義的改革更加成功！

> Bedik的真實面貌

by Eryn Snyder, Temple University, 美國



Eryn Snyder 榮獲 2012 年的 Rachel Tanur 視覺社會學紀念獎 (Visual Sociology)。該獎項每兩年由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頒發，並由 Mark Family Fund 贊助資金。ISA 的 Visual Sociology Thematic Group (TG05) 是該獎項的評審團。此外，TG05 也在 2008 年 ISA 會議上舉行頒獎典禮。關於 Rachel Tanur Prize 的更多訊息請到 <http://www.racheltanurmemorialprize.org>

Bedik 位在塞內加爾東南邊。Bedik 的女性每天要從附近的水井取水扛回城鎮內，這樣一天要來回 4 到 6 次。在某個炎熱的午後，Indar 村內的幾位女性邀我去照相。當他們自在地聊天散步時，我拍下了這張照片：這是 Denise 和 Marie。這是我 Bedik 村文化觀光攝影計畫的一部分。這個計畫的目的是去呈現 Bedik 村如何向觀光客展現他們的文化特色。村人覺得我可以拍拍他

們村內女性的傳統服飾和髮飾以及其傳統工作。所以我並不意外這張 Denise 和 Marie 的照片會是他們最滿意的一張。而我很感興趣的是他們認為這最能代表所謂「le vrai Bedik」－真實的 Bedik。這個影像讓人們覺得 Bedik 村似乎與世隔絕，未曾受到全球化的侵蝕一樣。此外，這也讓說明了女性勞動的拜物化：背著水的女性就是非洲純樸的代表。當我們稱 Denise 和 Marie 代表著「vrai Bedik」

時，Bedik 彷彿繼承了其文化傳統般的純真，女人就是文化知識的載體。那重複的姿勢，背對著鏡頭，這幅景象也象徵的某種匿名性。她們代表了 Bedik 村的活力，也代表了 Bedik 文化的韌性。扛著水的女性還代表了這個意義：自主性與優秀的能力讓女人可以勝任這份工作。■